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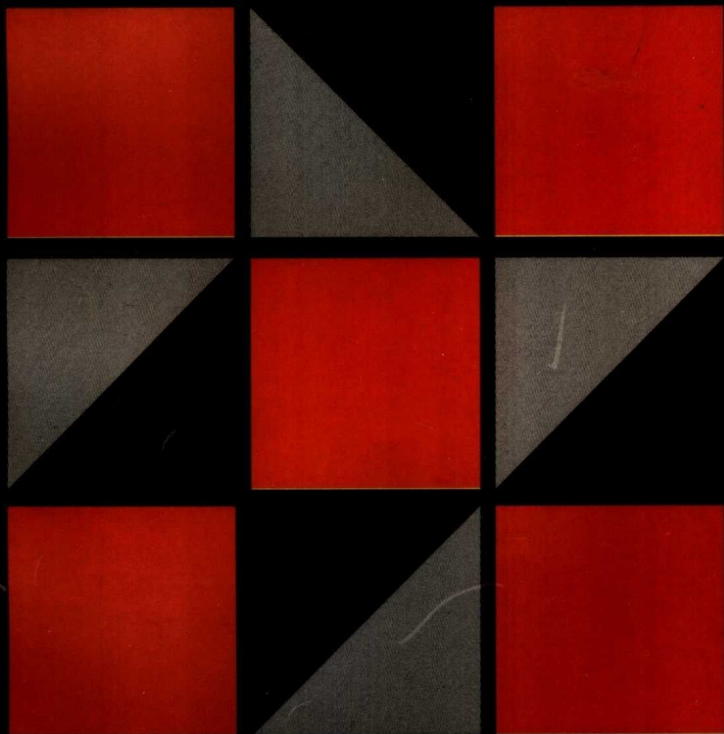
时代的精神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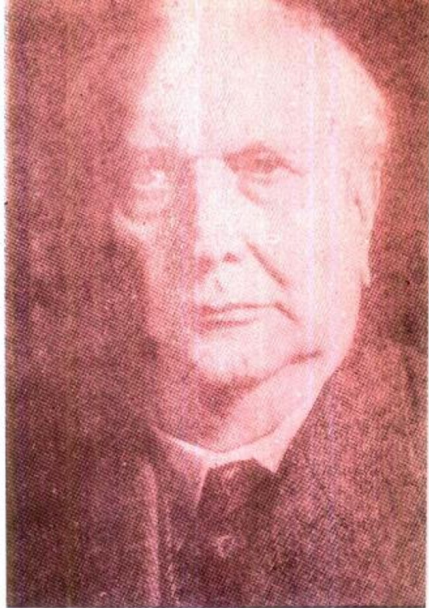
Man in the Modern Age

[德] 卡尔·雅斯贝斯著

王德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时代的 精神状况

Karl Jaspers
MAN IN THE MODERN AGE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51
根据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公司 1951 年版译出

时代的精神状况

丁德卡尔·雅斯贝斯 著

王德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5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3 字数 130,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 - 13,000 册

ISBN 7-5327-1828-X/B·087

定价: 12.70 元

译者的话

好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准备研读而后翻译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时，曾有比我更熟悉存在主义者的著作的朋友对我说，雅氏的著述比海德格尔的书好懂多了，他的语言通俗、明白。这一说法鼓舞了我。然而，随着翻译工作的实际展开，我却愈益强烈地感受到了移译这些文字的艰难。这种艰难倒不是出于抽象难解的概念、术语，而是在于雅氏的那种生动而又简练的语句所包含的寓意深厚的隐喻。要把这些隐喻以同样生动而简练的汉语再造出来，几乎是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过反复的琢磨以及对译稿的再三修改，我终于不安地向出版社“交了卷”。正如富于经验的翻译家们常说的那样，翻译总是一项“遗憾的劳作”。

无疑，海德格尔的著作也是极为难译的，但难译的性质却与此不同。海氏意在本体论的创新，意在对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全面改造，故而一弃传统的哲学表述方法，使用一套新的术语系统，造成了阅读和移译的巨大困难。至于雅氏的作品，则犹如一位智者面对着不是前来求知识、而是前来求智慧的人讲话，这些作品力图唤醒其沉睡中的洞见和勇气，力图促使其领悟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使命。这样的讲话不包含任何确定的定义、推理和结论，而是在夹杂着隐喻的陈述中，力图达到一种对“实存”(Existenz)的澄明，即对人之作为人的存在的本原的澄明。译者能否不辱使命地接近这样的澄明呢？看来，

这只能等待读者的鉴定了。

海氏著作与雅氏著作各自不同的难译之处恰好也反映了这两位同是德国存在主义奠基人的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区别。这重要区别主要在于他们两人各持不同的哲学研究方法和目标。

雅斯贝斯反对将存在主义思想做成一个哲学体系，在他看来，既然已经达到了对于人的本原存在的洞见，那么，作为学问的形而上学已是不可能的了。哲学在今天的任务不应该是再度使自己完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因为人之真正作为人的存在(实存)既不能被科学也不能通过思辨哲学来认识，它不是知识的对象。哲学思维的真正任务不是认识人的存在(因为一旦去行认识，就是使人的存在变为对象，使之成为客观的事实性的存在，而这正是从实存哲学已经达到的洞见那里倒退，退回到传统哲学的樊篱中去)，而是通过对实存的澄明而使之显露，诉诸每个人的实存的可能性，激发其领悟到诸如死亡、苦恼、斗争、罪责等这类在被认知的既存的事实世界边缘上的边界状态，并在这种边界状态中作出事关人之未来命运的决定。正因为雅氏哲学的方法和目标是如此，所以它不使用普遍范畴的形式来谈话，而是着力于提出问题，阐明思想的选择，引用大量心理的因素以彰明实存在现时代中的堕落或者隐喻人的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与雅斯贝斯不同，海德格尔仍然希望去完成改造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宏伟事业，他仍然力图用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对人的有限存在作前逻辑的先验分析，以求通过这种分析开辟一条通向一般本体论的新路径。他在这种努力中所写成的著作是特别晦涩难读的(如《存在与时间》)，这恰恰也表明了这种努力的艰巨性——想要解决的任务(分析非理性的存在)与解决任务的方法(运用概念的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是否一定

I

说明了海德格尔所追求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呢？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只能是哲学之走向未来的进程本身。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的这一哲学事业在当代西方具有十分真实的意义，这意义在于它是要为处于虚无主义严重危机中的西方精神道统的革故鼎新开辟一条可能的道路。

雅氏与海氏之间的上述差别，使他们的作品各自吸引具有不同兴趣的中国读者。对于想要从现代的视角去理解西方精神文化之根，并且想要辨认其今后可能的变化的人来说，海氏的作品是必定要读的。而试图明了存在主义对现代西方人精神困境的全面剖析的人，常常可以在雅氏的著作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差别虽在，其本无二。雅氏与海氏之共同所本者，乃是确认“人存在着”这件事本身具有终极的、绝对的意义。笔者愿意在此就这一“共同所本者”赘言几句，或许有助于一些并不十分熟悉存在主义思想形成之原委的读者去把握贯串《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的基本思想。

存在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固然知道“人存在着”这一基本事实，并且也常常赋予该事实以不平常的意义：人是理性的，人是自由的，人是唯一可能有道德的，等等。但是，当需要说明人的理性、自由、道德能力等这些使人的存在与其他存在物区分开来的价值、意义究意源于何处时，以往的哲学都从人的存在本身脱离出去，另外寻找一个能够给出人的存在之价值与意义的绝对者，从而把人的存在当作由这个绝对者所安排出来的一个特殊事例。这个特殊事例由此便在绝对者中得到安身立命之根。这个根，无非就是也包括了人的存在的世界的本质。在宗教那里，它可以是神、上帝；在思辨唯心主义那里，它可以是绝对理性（无人身的理性）；在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那里，它是作为万有之本原的物质性。如此追寻并去确定世界本质的思

想努力，是差不多所有的近代哲学所共有的旨趣。

但是，现代欧陆哲学的主导倾向开始摒弃这一旨趣，因为它被另一种根本情绪所笼罩。最早、也是最深刻地表达这一根本情绪的人是尼采，他呼喊出了“上帝已死”的声音。上帝已死，其实就是人的存在的绝对本质已死，人不得不走出自己在精神上的“童年期”而开始进入无所依傍的“成年期”，不得不开始经历极为痛苦的“精神断乳”。西方人最初没有听懂他的声音，但不久之后，由于世界史上的惊人魂魄的变故（两次世界大战），才开始在内心深处领略这声音的如雷贯耳之力。现代西方人在内心深处已经发现，人的生命和精神的一切价值一向所依赖着的关于人的存在在绝对者中得到安置和生根的知识，已变为可疑的、表面的、相对的，并且从终极的诚实来看，只不过是假象。这一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自古希腊时期以来所形成的西方精神道统。一个比历史上任何形态的虚无主义都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虚无主义的时代终于到来。当人与世界的一切由知识所建立起来的内容关系都破裂之时，当在被那支撑着人并赋予人以意义的一切世界秩序所遗弃之时，人感受到了无限的孤独和无限的荒谬。几乎可以说，人在精神上已经死了。但是，此时就有存在主义站出来说：人没有死！存在主义力图向人们指出，当一切似乎牢不可破的“客观真理”都已瓦解之时，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瓦解，这就是被“客观真理”所遗弃了的人“存在着”。当一切“客观的”价值和意义都分崩离析之时，“人存在着”这一事例本身仍然是一个富于意义的事例。于是，人的“存在”现在成了哲学必须关注的中心。但关注的结果，不应该是再度把它规定为“自然的存在”，或“理性的存在”，或“作为上帝之摹本的存在”，因为这类存在归根到底是西方精神传统中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发展的产物，是“遗忘了存在”的结果。当

“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最后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当代虚无主义——已经来临之时，我们不可能重新把“人的存在”客体化、事实化。这个存在已被合适地理解为终极的、无条件的存在中心，它是行认识的理性所无法进入其中的，它不包含知识，不包含任何确定的、有条件的内容，它是可能性。它在一切知识、秩序所及范围的边缘上，对这种边缘的体验，就是人对死亡、苦恼、罪责和斗争的体验。然而，正是这种作为可能性的存在（人之“实存”），才是世界及其外观的历史进程的本原。人，只要没有完全地被事实化、客体化，就总是有机会体会到自己是这一本原，从而意识到自己应该负起作为人的责任。处于现时代中的人（《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1933年英译本的书名正是：《现时代的人》），其诸多罪恶与堕落恰恰源于人之遗忘了自己的实存，而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自由与责任全然托付给了客观知识和“客观真理”。

上述思想，即是支配着《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的各种富于启发性的具体叙述和种种力图证明实存的隐喻的基本思想。

也许，对于专门研究或已相当熟知存在主义的读者来说，上面所叙述的至多只是表达了对于存在主义的一种非常基本的了解。的确如此。然而，就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了解常常容易具有抽象的、单纯学理的性质，同时又在内心埋藏着颇深的疑惑。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原有不同于西方的精神道统，故而对于“形而上学世界观”所导致的当代虚无主义难有体会，况且，中国社会当下的实际状况和进程也与当代西方社会差异甚大。诚然，有许多中国人早已从不少文献资料上熟悉了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或遏制科学主义的主张或思潮，但对于这一切还是难免不解之感。须知，当下的中国人远远谈不上感受到科学主义的危害或知识的统治、技术的统治对人的存在的威胁，而是正

痛感自己民族在科技上的落后以及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缺乏秩序与合理性，正以史无前例的迫切心情想要达到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种种与科学精神相一致的生存状态。于此种情况下言及西方社会因科技昌盛、市场经济发达所生的精神文化病症，确乎会使人产生隔靴搔痒之感。不过，假如我们读一下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这种感觉会减轻许多。该书虽然写于1930年，但是它对西方人在当代的精神状况及其所由形成的历史根源与广阔的现实社会生活背景所作的深刻而又生动入微的演述，至今仍未过时。雅氏善于揭示社会现象的精神底蕴，颇能引导我们设身处地地体会当代西方文化的总的氛围以及西方人的基本心态。

这本书原是雅氏受人之托而写的，是要放到包含有一千种书的“小格斯兴丛书”中去的。当时雅斯贝斯正在撰写其宏篇大作——3卷本的《哲学》。在写作过程中，他逐渐使自己的思想达于清晰和成熟。适逢此时而应命去讨论“时代精神”，对他来说，正是得心应手的事。在这本“小书”中，他高屋建瓴地回顾了西方人“时代意识”的起源（时代意识并非从来就有，在雅氏的论题范围内，它是西方文化精神在近代发生转向的产物），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原则，讨论了科技进步的文化前提及其对社会形态变迁的作用，讨论了民主政治与贵族理想之间的对立。全书以实存哲学式的反思（不是那种思辨性的历史哲学的反思）作底线，描画了与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的巨大震撼以及这种震撼留给当代西方人的困境。凡此种种，均探及西方文化的精神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内在冲突。这一切虽然谈的都是西方人的“家务事”，但是，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来说，却是不可不拿来研究一番的。当代中国人已不得不再一次认真思考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精神传统的

关系。自“五四”前后以来，这是一个始终回避不了的大课题。

最后，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在此提出的一点是，在现代化与民族精神传统的关系问题上，雅氏的这本书对于我们仍然仅仅具有借鉴的作用，因为，对于西方人的“家务事”的考察，实存哲学只是代表了诸种可能的视角之一，尽管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视角。

我们不应该不加批判地落入存在主义的意义域中去探讨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立场。在这种立场上，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并非导向人之失去家园的漂泊无根状态，我们相信现代化是走向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科学、理性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觉承担自由之责任的决定（后者用雅氏的话说，即是“在爱的交往中的实存之实现”）是并非彼此冲突的力量。我们这种信念的依据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客观真理因素。诚然，存在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了凝固为特定知识形态的真理往往在社会生活中异化为排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秩序”和无形的律令，但是，真理，作为在人的历史实践中生发出来的现实观念力量，仍然是每个人必须追求和分有的人类总体性的精神财富，仍然是人类在“成年期”中走向未来时必须点燃的明灯。在一切严峻的时代课题面前，人的责任，不单单是个人自决的勇气，而且也包含在实践中探索真理的努力。

本书的汉译，依据的是1933年的英译本。其中个别段落曾请俞吾金教授和吴建广先生根据德文原版协译，在此谨致谢意。另外，我还要向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几位始终关心和帮助着本书的翻译工作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德峰

1995年7月6日于上海康绥公寓

英译本重印前言

本书写于1930年。当时我虽相当了解法西斯主义，但对国家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我还在为书稿的完成而喜悦时，十分震惊地听说国家社会党人在1930年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初的胜利。书稿被搁置一旁有一年之久，因为我不想让它在我的三卷本《哲学》之前问世。《哲学》在1931年发表。该书发表后几星期，本书也出版了。

为了阐明那个时代，我利用了仅属于那些特别岁月的事实材料，因而本书在许多方面都感染了当时的气氛。尽管自它问世以来已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若考虑一下今天的哲学状况和世界情景，那么我认为，它在现在和当时一样有效。

试图作哪怕最微小的改动，如今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篡改。此次德文第五版的英译本的重印——与此同时，德文第五版也在德国重新发行——比之1931年的初版，仅在文字风格上有一些修改，而所用材料则一如初版。

卡尔·雅斯贝斯

目 录

英译本重印前言

| | |
|--|----|
| 导 言 | 1 |
| 一、时代意识的起源 | 3 |
| 二、当代状况的起源 | 13 |
| 三、状况概说 | 20 |
| 四、阐明当代状况的途径 | 26 |
| 第一篇 生活秩序的界限 | 28 |
| 一、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 | 29 |
| 二、群众统治 | 31 |
| 群众的特性 | 31 |
| 群众的影响 | 33 |
| 三、技术性的群众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 | 35 |
| 先进技术时代中的意识 | 38 |
| 机器的统治 | 42 |
| 领导 | 46 |
| 家庭的生活 | 49 |
| 对生活的畏惧 | 53 |
| 工作中的快乐问题 | 55 |
| 体育运动 | 58 |
| 四、稳定不变的生活秩序的不可能性 | 61 |
| 五、企图证明被当作绝对而表述的生活秩序能够建立的种种尝试(现代诡辩) | 64 |

| | |
|-----------------------|-----|
| 对群众的崇拜 | 66 |
| 故弄玄虚的语言和反叛的语言 | 66 |
| 不作决定 | 69 |
| 精神被用作手段 | 70 |
| 六、当代生活秩序的危机状况 | 71 |
| 第二篇 整体中的意志 | 77 |
| 一、国家 | 78 |
| 国家意识 | 79 |
| 战争与和平 | 86 |
| 政治活动的方法与影响范围 | 91 |
| 二、教育 | 94 |
| 教育的意义 | 94 |
| 国家与教育 | 97 |
| 三、整体的不可理解性 | 100 |
| 第三篇 精神的衰亡与可能性 | 105 |
| 一、教化 | 106 |
| 教化与古典世界 | 107 |
| 教化的普遍降格与能力的专门化 | 108 |
| 历史的汲取 | 111 |
| 新闻报刊 | 115 |
| 二、精神的创造 | 118 |
| 艺术 | 120 |
| 科学 | 125 |
| 哲学 | 130 |
| 第四篇 当代关于人的实存的观念 | 135 |
| 一、关于人的科学 | 140 |
| 社会学 | 140 |
| 心理学 | 142 |
| 人类学 | 145 |

| | |
|-----------------------------|-----|
| 二、实存哲学 | 149 |
| 第五篇 人类可能的未来 | 154 |
| 一、无名的力量 | 154 |
| 自由的颠倒 | 154 |
| 诡辩者 | 157 |
| 关于时代之实在的问题 | 160 |
| 当代人 | 162 |
| 没有阵线的战斗 | 165 |
| 二、个体自我在当代状况中的维持 | 167 |
| 嫉世或入世 | 169 |
| 技术的统治权、原始的认识意志、无条件的联系 | 171 |
| 向历史性的沉入 | 176 |
| 人的高贵性 | 179 |
| 团结 | 181 |
| 贵族与政治 | 183 |
| 对高贵的冒僭 | 185 |
| 哲学的生活 | 186 |
| 个体自我的状况 | 186 |
| 三、沉思的预见和能动的预见 | 189 |
| 沉思的预见 | 189 |
| 什么即将发生? | 192 |
| 能动的预见 | 195 |

导 言

一百多年以来，人类状况的问题愈益紧迫起来。每一代人都曾经从自己的角度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以往，仅仅是少数人焦虑地思考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而现在，大战以后，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已是人人都清楚了。

可是，这一课题不仅无法被探索穷尽，而且对它难以确定的定义，因为恰恰就是对它所作的关注改变了它。过去的状况可以视为终止了的状况，它们已幕落剧终，已度过自己的时辰而不复存在。现在的状况却具有激发人的特性：对它的思考有助于确定从它当中将要演变出什么。

尽人皆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状况并非一种终极状况。

曾有一些时代，其中的人认为，他的世界是处在逝去了的黄金时代与随上帝目的之实现而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之间的一个持久不变的中间阶段。人使自己去适应他所遇到的生活而不想改变它。他的活动限于努力改善自己在周围环境中的地位，而环境则被认为在实质上不可改变。在这些环境里，他有安全的港湾，这港湾就和他一样，是与天、地连在一起的。这世界即是他自己的世界，哪怕这是一个并不重要的世界——因为，对他来说，仅仅在一个超验的王国中才有真实的存在。

同这些时代的人相比，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对于古时的人来说，生活

与认识的统一似乎完全是不证自明的。对此，我们已不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过去的同类是在现实宛如被蒙上面纱的条件下生活的。至于我们自己，则已能按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事物，而这就是生活的基础在我们脚下动摇的原因。既然思想与存在的一致（这种一致，以前从未受到挑战）对于我们已不复存在，那末，我们就在一边看到生活，在另一边看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同伴对生活的意识。我们不像我们的前人那样单只想到这个世界。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的世界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生活在一种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成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这一运动、流动和过程把我们投入了无休止的征服与创造、丧失与获得的漩涡之中。我们在其中痛苦地周旋，大半是屈服于潮流的力量，只能偶尔在有限的范围内尽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一般地属于人类的状况之中，而是当这一状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来时，经历着它。它来自以前的状况，并向其后的状况演进。

于是，我们关于这一我们自身在其中是一个因素的运动的意识，就有一种奇怪的双重性质。由于我们现在所知的世界不是最终确定的，我们的希望就不再寄托于天国，而是转向了人间。人间可以由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所以，我们对尘世完善的可能性抱有信念。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即使在有利的情况下也只有有限的干预力量，而且还不能不承认他的活动的结果远非取决于他所致力的目标，而是取决于总的环境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痛心地认识到，他的影响之所及，比起他所抽象地意识到的广阔的可能性，是多么的狭小。最后，这个世界的

进程(无人对之满意)在许多方面都令他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蔓延开来。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被种种事件拖着前行的。这些事件,在他比较乐观时,曾是他希望加以引导的。一种宗教信仰认为,人在神的面前等于无。抱有这种信仰的人,不为变化的事件所扰。变化是上帝意志的产物,并不被认为同其他能够设想到的可能性有什么冲突。然而,今天,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响了所有的大门。但与此同时,这类骄傲与自高自大所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人该怎样适应这种情况而不受其影响?这是当代状况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以充分的意识研究他的世界,并改变它以符合自己的目的。他已经学会如何干预“自然的因果关系”,只要这种关系仅仅是不变的相似物的无意识重复。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己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

任何想要阐明当代状况的人都必须从考察下述问题开始:当代状况迄今为止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一种状况一般地说来是怎样的?它表现出哪些方面?对于人的本性的问题,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人类正走向怎样的未来?这些问题愈是回答得清楚,我们将愈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而进入无知的不安之中,将愈是迅速地到达这样的边缘:在这个边缘上,人认识到自己是个体。

一、时代意识的起源

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